

中国封建社会运行的特点及成因

张 琢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命运、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它的难点和特色，就内在基础而言，直接取决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农业自然经济为主要基础的封建社会）演进的特点。而且，其中某些规律性特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在现代化过程中，还一再以或多或少变化了的形式重新显现出来。把握这些特点，是认识中国现代化的规律和特点的前提，懂得了历史的中国就有了认识今天的中国的基础。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和中国封建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学界、经济学界以及解放前的社会学界的学者曾进行过多次热烈的讨论，从不同侧面提出了一些见解。其中，近十年的讨论在继承“文革”前的探索的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开拓，许多论点是富有启发性的。只是由于中国社会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被“废除”达27年到1979年方恢复，在这方面尚未交出自己的新答卷。而要全面回答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特点，以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很强的社会学是应该发挥自己的必不可少的功能的。本文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就中国封建社会运行的特点以及决定和影响这些特点的主要因素作一初步的综合性分析。

一、农业文明空间推进的规模大、时耗长

农业文明的炊烟在约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已在中华大地升起，而且南北都有种植的粮食作物种子遗存发现，证明中国南北种植业的发生都是很早的。以铁制农具和牛耕为主要生产工具，并注意选育良种、农田水利建设、施用粪肥、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程度较高（以古代标准）的定耕农业，以及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而形成的家庭农业自然经济体制的普遍化过程，首先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和逐步普及于水土条件都较宜于开垦利用的中原（今河南、山东和陕西、山西、河北南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由于水土、气候等条件类同，在地理上连成一片，无高山大海阻隔，在名义上的周王朝统领下，各诸侯国竞争激烈，合纵连横，人员交往频繁，互相学习，每一先进工具和耕作技术一出现便得到较为迅速的推广，所以这一地区的中心地带的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以及相应的由领主经济向地主-小农经济的转化仅用了约200年。

在秦、汉大一统的条件下，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得以向四周推广，在纪元初，其范围大体延伸为北到长城、西至陇东、南临秦岭淮河以北。此圈之外的北方和西方仍为游牧狩猎民族的活动区域，而南方则仍处于“火耕水耨”的游耕状态，牛耕未普及，渔猎尚具有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的动乱，尤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经济和人口遭到空前劫难，这场灾乱的破坏作用是史学家所公认的。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的人口向四周“蛮荒地区”的流亡和游耕-渔猎民族对定耕集约型农业文化的吸收，扩展了农耕区域，尤

其南方长江中下游包括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的江、河、湖平原地区的集约化农业得到了显著发展。这是一个从总体上看（特别是中原地区）经济水平和人口相对下降，而从周边上讲（特别是南方）农耕文化质的提高和量的扩展时期。

在隋唐时代，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和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状态，但是接着却是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中原发达地区再度陷入兵荒马乱之中，经这一事变，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例由6：4倒转为4：6。^①这个人口比重的变化也大体反映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如果以公元前475年春秋战国之交为中国封建社会起始的“绝对年限”，1840年鸦片战争为全封建社会终止的“绝对年限”，那么，在这2315年中，以安史之乱为转折，前1230年是北方的人口和经济密度高于南方，后1085年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半世纪共1235年，则为南方超过北方，正好约各占一半时间。

到北宋末年，游牧民族再度入关，中原出现又一次民族大迁移和相应的经济文化的南流，农耕文明浸润到岭南、珠江流域（湘南、两广、福建和贵州）。但是广大的西北、西南和东北少数民族居住地的大片土地，仍未进入定耕集约农业的发展阶段。在明代，云南仍是犯人的主要流放地。在西北方面，虽历朝有“屯垦戍边”部队和移民时断时续、时进时退的零星开发，^②但直到封建社会后期（元、明、清），甘肃、宁夏及青海东部才由内地移民加以永久性开拓，至清末小批移民方陆续进抵新疆中部。关内向东北和内蒙草原的大量移民则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才形成浪潮。直到解放时，西北、西南许多边远地区和闭塞的山区还处在相当原始、粗放的游牧和游耕状态。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以空前的组织力量，采取种种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利用近现代交通和科技手段，领导各族人民经过几十年奋斗，才使这些地区基本完成了向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定居农牧业的转化。

可见，正是由于中国幅员的辽阔、地理条件的复杂多样，集约农牧业的推进颇为艰难，遂延续到今天才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农业文明的普及，历时两千余年。这个**中国农业文明量的扩张过程，是由“太平盛世”的发达地区高水平农耕文化向周边落后地区的辐射和动乱时期向偏僻地区的流亡这两种主要形式交替而成功的。**

中国农业地带之广袤、农业人口数量之多、空间地域推进所耗时间之长，是古代其他任何国家之所不及的，这便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在量的扩张上显示出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现代化过程中又一次显现出来。只是现代化的始发区域与推进方向与农业文明由偏北的中原地带向南方及其他周边推进不同，是由东南沿海向中部、西部梯度推进。

二、由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决定的周期运行

自周秦以来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力（人力、畜力和铁木农具等手工工具）没有根本变化，基本的农作物和家畜、家禽（如北方的小米、南方的大米，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均已齐备；茶、丝、麻则是闻名世界的中国传

^① 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中国人口地理》（上），第3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

^② 据统计，我国自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多年中，较大规模的驻军和移民垦荒至少有千次以上，其中军屯667次、民屯337次、商屯150次。（见吴斐丹等《试论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及解决途径》，载《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4期。）

统的经济作物；以后又从西亚、南亚和美洲引进了麦、薯类、玉米和棉花）一直延续到现在，以小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男耕女织的家庭农业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多大变化，甚至生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多大提高（封建社会后期，由于人均土地占有量的减少，人均产量和人均收入反而有所下降^①）。与这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一致的家国一体的封建宗法制度也始终没有根本的质的变化。唯一显著的社会运行规律，是周期性的经济政治危机，体现为治-乱的循环（当然不是简单的封闭式循环，而是每一循环都有所变异，只是这种变异未能达到整体的质的突破的水平）和王朝的更替。

周期性的经济政治运行在其他国家封建时代同样也存在，只是中国的这种运行与其他国家比起来循环规模更大更典型；与东方各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是循环周期环环相连，从未间断；与西欧在封建社会的母腹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终于由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较，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循环运行直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到来之前，始终未能跳出封建社会的窠臼。

那么，这种特点是怎样形成的？这就要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特点中去找原因了。

中国大约自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即已确立了小家庭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家庭这种社会经济生活单位把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劳动与家务生活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经济-社会、生产-生活功能兼备的结构，很适合于个人操作或家庭成员简单配合的手工和畜力耕作，便于组织生产和生活，使劳动力和时间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利用。在具备适量的耕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时候，这种“农家乐”的田园生活便可正常运行。但是，这种理想状态是很难保持的，这种小家庭社会经济单位实在太脆弱。单就土地而言，当开发初期或每一战乱结束后的地广人稀之时，耕者要获得一份耕地或开垦一块荒地还不大成问题。这时，开国创业的“明主”也往往能采取种种政策励精图治，奖励农桑，珍惜民力，休养生息，使社会经济得到兴旺发达。如此，经过几代人，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了有限的耕地的增加速度，人均占有的土地就会减少。中国向来实行的是与西欧和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不同的土地财产由诸子平均分割的继承制，于是土地愈分愈小、财产愈分愈少。至于一般农家，只要死一头耕牛，更不用说丧失一个主要劳动力，就会破产。由于中国封建时代就有土地自由买卖的制度，陷入困境的农民便只有出卖财产、土地乃至妻儿，沦为佃农、奴仆或流民。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的的基本占有形式是地主（皇帝为最大的地主）所有的土地租佃制和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拥有小块土地而又需租种部分土地的半租佃者。而无论哪一种，都是小农户（佃农或自耕农）的小块土地经营。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化、资本的社会积聚、规模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扩大的应用，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②何况，对于占农民大多数的佃农来说，这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也不是属于他的，他还得承受通常高达50%以上的地租剥削，加上政府的种种徭役和赋税，往往是“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③根本谈不上资本积

① 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计算，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均粮食产量只及唐朝时一半。（《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10页。

③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累、扩大再生产或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更无力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农民平时在地主和官府的双重压榨下在贫困线上挣扎，一遇天灾人祸，就会破产，沦为失去生计的流民。而地主、豪强便乘机兼并土地，土地越多地租越多，但是土地的集中并非生产资本和经营的扩大与集中。有钱的地主自己并不经营农业，不会拿这些财富去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而是将它消费掉，或用来买更多的土地或放高利贷，以增加财富的简单积累，而很少用于生产的投入，最后还是用于消费。地主土地占有量的增加，没有改变或扩大生产规模，他的领地仍然由小家小户的佃农来耕种，而且佃农愈贫困，经营规模便愈缩小、分散。这样，一方面是愈来愈贫困化的佃农和流民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土地的集中和骄奢淫逸的寄生人口的增加并愈益腐败，呈现出一种两极化趋势，促使社会矛盾激化。这时，即使“明智”一点的政府采取一些限制土地兼并的措施，而由于皇帝和政府官僚阶层本身就是大地主，根本无法自我限制，即使暂时限制一下，也不过维持不死不活的分散的小生产状态，最后势必导致农民起义，社会陷入动乱，造成人口的大量逃亡。在腐败的旧王朝灭亡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王权，又来招抚流民开垦荒芜的土地，社会进入新一轮循环。这就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与土地占有方式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周期性循环运行的特点，我们把它叫作“内周期”**。

这种内周期，在经济基础上，主要表现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与分散的矛盾运动、农民与土地的结合与分离的交替过程；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治-乱循环。

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之庞大，组织和控制力之强，是世界其他封建专制帝国难以企及的；而需要并导致建立那样一串相互衔接的封建王朝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正是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

分散、弱小的小农经济无法兴修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工程，也无法抗拒游牧民族的侵略。它需要政府的权威来组织水利工程的实施、防卫和其他社会管理。马克思指出：“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①孟子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②中国的“亚圣”也是懂得国家正是作为防御外患的工具产生和存在的——如果没有外患，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而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向来也是借口“攘外”须先“安内”，借外患来凝聚在专制压迫下涣散的百姓，并常常以最能引起国民“同仇敌愾”的“里通外国”的“卖国贼”等罪名来剪除其“内患”的。

中国定居农业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与水利工程和防卫工程的兴修是同步的。中国上古时代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和原始时代的另一位部落首领鲧都是筑城的始祖：“黄帝筑城邑，造五城”；^③“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④“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之始也”。^⑤与这种传说相印证，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五六千年前的“龙山文化”的遗存中发现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4页。

② 《孟子·告子》。

③ 《史记·轩辕本记》。

④ 《黄帝内传》。

⑤ 《吴越春秋》。

夯土和石块筑成的围墙的残壁，^①有学者认为中国城镇便起源于这一时期。^②至少在公元前七世纪（公元前657年），就有了关于城墙的确凿记载：“楚国方城以为城”。^③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筑城，其中最著名的为战国时期北方的燕、赵、秦等国的长城。秦统一中国后，首先便是派太子统重兵监督将这些长城予以加固，连贯为东起辽东，西到甘肃长达13 000余里的“万里长城”（有些地段还有多层，构成内、外长城），以后历代不断修补，微观位置虽时有变迁，但大体走向未变。这便是直到清代中期（18世纪）中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大体分界线。依靠长城和重兵的护卫，算是勉强补充了中国的相对自然地理隔绝机制的北面的缺环。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人类历史上留下的最雄伟的土石防御工程，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典型象征，正体现了中国农业自然经济集合数量的巨大规模和地域的广大，体现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中国封建专制帝国政治上的巨大组织动员力量，体现了守土重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的中国农业民族在军事上的防御性的特征。依靠这个自然-人工合成的相对隔绝机制，使长城以内彼此相连的各大河流域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农业经济和繁衍人口的环境。

中国治水的实践和史籍的记载比筑城的实践和记载还要久远，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遗址中，我们便看到了环绕居民点的排水沟，大禹治水的故事更是尽人皆知。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竞相兴修灌溉和航运水利工程，以后历代较有作为的帝王和地方的“父母官”都把兴修水利作为重要的建设任务。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关中地区、银川平原、河套地区和淮河流域的淠史杭地区，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中下游平原等等，凡是农业发达地区，都离不开灌溉工程。在中国众多的大规模水利工程中，最著名的便是与长城齐名、迄今仍是世界最长的大运河（隋代长2700公里，现为1747公里）。它的修建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期，在现在的江苏扬州地区修建的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④继而又延伸到黄河流域南部与黄河支流接通。秦代在北方修筑长城的同时，在南方开通了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灵渠（即今广西兴安运河）。隋（公元六世纪初）已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珠江六大水系沟通，从而把中国关内各大流域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为人员和物资的交流，促进民族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大一统的形成和巩固特别是京畿的供应，发挥了长久的巨大的功能。长城随着火器特别是爆破、航海、航天技术的到来，已逐渐失去了其防御价值，现在仅能作为古文明的象征供人们旅游观光了；然而，运河却随着经济及各方面的发达，比古代承担起更重、更繁忙的运输、排灌、南水北调等综合功能。

由于有这样广大的适合农耕的地区和天人合一的相对地理隔绝机制的保护，使农业经济得到了长期稳定的发展，并繁衍了众多的人口。

正是凭借这种相对地理隔绝机制和中央集权的强大防御力量，遂使强悍的游牧民族难以南侵（如秦、汉、唐及北宋和明的前期与中期）。然而，当关内政权腐败，发生内乱时，游牧民族便会乘机破关而入。但是，由于关内的回旋余地是如此之大，因此“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如东晋和南宋，北方遭到游牧民族的浩劫，而南方反而由于北方的人口和经济文化的南迁得到了发展。即使外来的游牧民族夺取了全中国的政权，也由于其与中国

① 《河南新发掘一处龙山文化遗址》，载《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8日第三版。

② 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③ 《左传·僖公四年》。

④ 《左传·哀公九年》：“秋，吴成邗沟，通江、淮。”哀公九年即公元前486年。

内地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相比的相对落后性和人口数量的绝对劣势，结果还得用在这块土地上发育起来的固有的农业文化来治理这以农业民族为主体的臣民（如元、清两朝），占全国总人口不过百分之几或千分之几的游牧统治民族不仅在文化、生活方式上，甚至在血统上也经不住几代就混杂消融于内地原有居民中了。

然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府虽然发挥了防卫和兴修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功能，但是它首先是对下层的掠夺和专制压迫为前提的。庞大的政府官僚体系和军队，浩大的工程，尤其为了满足那无止境的奢侈、显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的欲壑而营建的豪华的宫殿、陵墓，使人民不堪重负。这样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庞大国家机器本身便成了压碎这个基础的异化的力量。而这种政权既然压碎了自己赖以立足的基础，它本身也就到了倾覆之日。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帝国秦王朝的灭亡就是一个典型。秦始皇吞并六国后，便忘乎所以，滥使民力无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秦统一天下后赋税“二十倍于古”，劳役“三十倍于古”。《帝王世纪》记载：“及秦兼并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犹以余力，行参夷之刑，收太半之赋，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全国服役人数多达二百多万，而据史学家和人口学家们估计，当秦通过酷战兼并六国时，人口不过二千万，仅及中国现在半个省的平均人口。如此沉重的赋役负担，怎么能不把百姓逼反呢？！陈胜、吴广就是在这种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死里求生揭竿而起，迅速蔓延为中国封建时代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威风显赫的秦帝国，其兴也猛，其败也速，仅历二世十五个年头便灭亡了。以后的一些大的王朝前期的统治者多少能吸收一些秦苛暴速灭的教训，能多延续一些统治的时日，但是基本制度仍是承袭秦制，也就从根本上无法逃脱像秦朝灭亡一样的命运。据白钢统计，中国自秦统一中国到近代捻军起义失败的二千余年中，小规模农民起义（不出县境的百十人的规模）不计，跨县的万人以上参加的起义就达千余次，平均每两年一次，而跨省的十几万人、几十万人以上乃至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也有上百次，平均几十年一次。^①除少数民族入侵夺取政权外，其他历代改朝换代多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且，即使是少数民族入侵，也往往是在内地朝廷腐败，农民起义已动摇了原有政权的基础之后方才能乘虚而入、夺取政权，元、清两朝的建立皆如此。

与这种经济、政治周期运行相适应的还有文化（主要包括伦理道德）上的周期运行。中国传统的政治是绝对君权的人治，“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统治者个人的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人者要先正己。政治伦理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的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人治的前提便是上行下效的表率作用。所以，政治伦理文化的存废不在表面的表彰道德与否，而是在实行，能行则在，不能行便是名存实亡。每一朝的开国皇帝和元勋，尚多少知晓些民间疾苦，历尽创业艰辛，比较能守志、勤奋节俭，为政较为清廉，但是登基之后，即使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也会“一阔脸就变”。当初，他在与项羽争雄时曾安抚百姓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②可是后来，甚至他也明知“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然而仅萧丞相一拍马屁：“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③

^① 这是农民战争史专家白钢专为本稿进行的粗略统计。

^{②③} 《史记·高祖本记》。

高祖便立刻欣欣然享用起那后世无以复加的未央宫来。同时，又是按照这个萧相国的主意，“据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①所以鲁迅说：“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②汉高祖这样的创业的“明君圣主”尚且如此，那些不肖子孙的堕落就更可想而知了。鲁迅曾借明代文学家陆容《菽园杂记》的比喻，把辛苦创业者比作“还债者”，而把那些享用现成的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的人物称作“讨债者”，他写道：“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③这就是封建时代治乱循环在作为文化现象的生活方式上的实际体现。绝对的专制，导致绝对的腐败——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腐败，这就是每一个封建王朝难逃的致命的综合症，只是发生的迟早和发展的快慢不同罢了。

以上就是构成中国封建王朝循环兴衰的内周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三、农业文明在各民族中的推进与社会发展的反复性

古代中国农业文明的地域推进，既是游牧和狩猎民族不断内迁转化为游耕和定耕农业民族的过程，也是内地农业居民不断向四周外迁扩散农业文明的过程。中国农业文明的地域推进，与农业文明在各民族中的推进是两位一体的过程。农业文明地域推进的时耗，也就是农业文明在不同民族中推进的时耗。中国农业文明推进的时耗，是地域和民族的条件(或因素)共同作用的体现。我们在分析了农业文明的内在矛盾和周期运行及其在地域上的推进后，还须对其在不同民族中的推进做一番考察。

现今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这些民族都经历了漫长的变迁史。其变迁的文明轨迹大体为渔猎、采集→游牧、游耕→定耕、定牧。从地域上看，是北面和西北面的游牧民族不断南迁，而南方特别是大西南的半游耕、半游猎的民族则是“田尽而地，地尽而山”，逐步向南方山区和西南高原地区退让。

游牧民族是游牧文明的活载体，农业民族是农业文明的活载体。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从社会文化形态上看就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民族互动关系的本质和归宿。二者在人口数量、占据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看是不平衡的，从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发展看，最终都是前者融合于后者，同时也使后者发生了量和部分质的变化。

下面我们还是从这种文化依存的地理环境入手来分析这两种文化的发生条件、机制及其互动作用。

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长江及其间的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在这个农耕区域的东、南、西南山水环抱的相对地理隔绝机制之外，北面却存在明显的大缺口。古代中国北面和西北面虽然有燕山、阴山等山脉和戈壁沙漠为阻，但是这些山脉并非绝障，对于拥有能高

① 《汉书·刑法志》。

② 《鲁迅全集》第3卷，第533页。

③ 《鲁迅全集》第8卷，第185页。

速长驱的马匹和作为“沙漠之舟”的骆驼的游牧民族来说,穿越沙漠也非难事,更何况山脉和沙漠间又有不少草原和山口便于通行。而且,正是在中国北面,从东西伯利亚横跨欧亚大陆直到中欧,有连绵万余公里的世界最大的森林、草原和沙漠地带,为狩猎和游牧民族提供了最宽广的游牧、狩猎和驰骋的疆场,其活动中心便是紧邻中国北面和西疆的蒙古高原和中亚细亚。

游牧民族骁勇善战,具有强劲的奔袭力量,构成了对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和欧洲农业地带的经常性威胁。由于游牧民族的高度的流动性和活动场所的广袤,使得农耕地带的民族即使在专制帝国最强盛的时候,也只能把他们驱逐到远方,而不能彻底消灭(如汉、唐将匈奴、突厥逐往漠北和西亚),时机一到,他们又会卷土重来,此起彼伏,未有已时。

这样,在近代火器出现之前以及游牧民族由游牧转向定居之前,农业地带的农业民族与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便构成了民族之间的战争的常奏曲;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互补和融合,构成了在西方的近代工业文明向东方文明挑战以前中国和整个亚欧大陆历史舞台上的主要内容。

逐水草而迁的游牧民族的高度的流动性和掠夺性,决定了它的进攻性;而农业民族的守土重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沉稳的性格,决定了它的战略上的防御性。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有利于其在同各民族经常性的交往(战争是民族交往和融合的最激烈形式)中吸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充当文化交流的桥梁,但是却不利于文化积累和人口的繁殖;农业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定居生活决定了它的求安稳的保守性,但是却有利于人口的繁衍和文化的积累。

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安全的威胁是经常性的,先秦以前且不说,仅自秦以来直至满族入关,除了处于僵持、臣服、“和亲”等暂时的和平状态外,经常是边患频仍,无以计数。内忧外患向来相提并论,外患之数,较大的据史书粗略统计也在千次以上,其中规模最大、入侵空间最广、最深入内地、延续时间最长的有五次。一是从西晋末年(公元296年)关西氏族起兵反晋开始到鲜卑拓跋部建立魏国,逐渐消灭割据者,于439年统一中国北部。这一时期大量后进民族(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为主)内迁并酿成历时一个半世纪的残酷战乱(旧史称“五胡乱华”,这五族就中华民族的大内涵而言,皆为中国人,以后大部分融合为汉族),其中尤以游牧民族匈奴族和羯族破坏性表现最烈(鲜卑、氐、羌三族入化较早,当时已从事定居农业,吸收了相当程度的农业文化)。《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第二次为五代(公元907—959年)时期。这一时期虽只有半个世纪,但上溯自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突厥人史思明率兵南下,游牧民族便逐步深入内地;唐末农民大起义,游牧民族沙陀人李克用又率部参与镇压黄巢,五代时的三个小朝廷(唐、晋、汉)都是沙陀人建立的。而且还有更北方的辽(契丹)的不断南侵河北、河南,直捣黄河流域,“千里之内,焚剽殆尽”,^①所到之处,“村落皆空”,“城邑丘墟”。幸亏南方在这一时期还未遭游牧民族侵扰,战乱较北方为轻,人口和经济尚小有增长,但是由于北方动乱、破坏厉害,唐末和五代中国总人

①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口仍减幅三成多。第三次是公元1125年游牧民族女真族的金国灭辽后乘势南下，于次年灭（北）宋，建立了西到阿尔泰山、东到日本海、北到外兴安岭、南到淮河流域的大帝国，至1234年灭亡。金国比五代时的游牧民族南下得更远，在一个多世纪中与南宋时战时和，尤其在初期南下之时，不仅对中国北方而且使金与南宋主要交战区的江淮地区也惨遭严重破坏。第四次是十三世纪的蒙古人扩张。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横扫中欧以东的整个亚欧大陆的征服行动。蒙古族建立的元帝国灭金、宋，中国人口减少在三分之一以上。自1234年元灭金到1368年元王室北迁，元朝灭亡，历时130多年，自始至终都处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对立之中，元代的人口和经济在元帝国政权相对稳定后虽有所恢复，但始终都未恢复到宋的水平。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游牧-狩猎民族满族入关并统治中国达267年（1644—1911）之久。这一次又是从北杀到南，像扬州、江阴、太仓、嘉定、长沙这些中国江南经济文化繁盛的名城，顿时都成了屠场。这次屠杀持续了二十年之久，以后逐步改变政策，才使人口和经济逐渐恢复。鲁迅总结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史写道：“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①是的，多少农业文明古国都毁于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华民族能经住这么多次巨大的冲击，不仅未亡反而经过艰难的考验更加壮大，这的确是人类古代史的最伟大的奇迹。

不过，游牧民族的挑战和内迁的作用也并非只有消极的一面。外来落后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一方面造成了经济文化的大破坏、大倒退和人口的锐减，同时这些民族又各自带来了自己不同的经济、文化和血统，为中华民族的经济的构成、文化的构成乃至血统的构成增加了新的成份和新的活力。我们在分析构成现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关系及各自的历史作用时，不仅应看到二者的对立，还要看到二者的统一即他们的互补的一面、相反相成的一面。如中国现在能领有这样一个世界第三的版图（就古代世界和现今较适于人类生存的中纬度地带而言，则为世界第一，因而中国人口数倍、数十倍于领土面积比中国大的高纬度地带的苏联和加拿大），就恰是这两种民族及其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合作的杰作。中国古代疆域开拓最大的不是农耕民族，不是“汉唐盛世”，而是元、清两朝的游牧民族，即以马上取得的天下；但是，游牧民族以“马上得天下”之后，则要靠善于守土耕耘的农业民族积累的经济、文化和人口的优势，通过“移民垦殖”、“屯田戍边”、“怀柔”、“归化”、“迪化”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手段的综合效用，使得这些地区得到长久、稳定的开发，从而使这些疆土的领有巩固下来。占我国现今领土大部分的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国土的开拓，正是这种游牧民族的武功和农耕民族的文治相结合的成果。

游牧民族的每一次大入侵，就带来一次经济文化的大滑坡，每一次下滑之后，接着而来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又使农业民族、农业人口、农耕地带都得到了量的扩张，并或多或少在精耕细作和手工业、商业方面有所提高，交通和城市亦有所发展。这样一落一起，形成中国农业文明螺旋式上升的周期性反复拓展。我们把这种由边缘或外域非农业民族内迁和农业民族外迁形成的由非农业民族转化为农业民族、非农耕地带转化为农耕地带的周期性冲突-融合运行过程称为中国封建时代社会变迁的外周期。这种外周期运转的社会动力就是以铁制农具和耕牛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全部农业文化。而在形式上则体现为作为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的活载体的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融合。

^① 《鲁迅全集》第13卷，第683页。

这里所说的“外”，无论从空间上或时间上讲都是相对的。如前所述，秦之前仅中原为“内”，江淮及华北北部均属蛮夷之区，西汉以后这些地区就化为“内”了；宋明将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都视为“化外”之地，今天东北到黑龙江、西至新疆，均为中国领域之内，而且都成了中国重要的农垦区和商品粮基地。就民族血缘讲，不仅56个民族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兄弟成员，而且就是占人口93%以上的汉族，也是到汉代才由不同的民族融合成的，以后又经过了与其他兄弟民族的长期融合的发展过程。可见，多数民族原也是由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我们中国人虽然十分重视“华夷之辨”、重视血统，然而事实上，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血缘成分却是十分复杂的。如果我们肯定中华民族是最大的杂种民族，从重血统的封建意识来看也许是最难以接受的难听的侮辱，而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则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而且这正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血缘基因之所在。

四、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综合分析

以上我们分析了中国农业文化在中国广袤的疆域上长期梯度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平静地量的扩张，还有贯穿始终的封建社会内在的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周期性的循环运行轨迹，同时伴随着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斗争与融合的周期性反复过程。这两种周期性的社会运行过程，不是各自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形成一种叠加现象，这种叠加的周期比单纯的内周期或单纯的外周期在时间上拉得更长，波幅也更大。

而且，不单是这两种基本矛盾（农业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与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矛盾）及其决定的内、外两种周期的叠加，与这两类矛盾纠缠在一起的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其中包括王室争夺王位的斗争、朝廷与藩镇等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斗争以及军阀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游牧民族的入侵、农民起义和对农民起义的镇压相交混，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重重叠加，使社会经济、文化遭到极为深重的破坏而同时又在畸形发展。如前述西晋从公元280年的诸王争夺王位的“八王之乱”始，导致北方各少数民族起义和内迁，各地分裂割据“五胡十六国”，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军阀之间大混战，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农民起义、民族起义纷纷爆发，直到隋统一中国，前后历近280年的大动荡、大破坏。这是内外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重叠交叉混战的一个典型。

中国封建社会运行的过程中，不仅各种内外社会矛盾重重，同时自然灾害也呈周期性规律出现。自古以来，许多史家都记载了这种周期现象：“六岁一旱，十二岁一饥”。^①“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②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据中国史书记载统计出：“中国每六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的二千二百多年间，中国共计有一千六百次大水灾，一千三百多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及水灾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③又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9年12月25日报导：中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共发生全国范围的大水灾1092次，旱灾1056次。《人民日报》报导，由民国上溯2500年间，仅黄河决口便多达1500多次，改道26次，三年两决口，百年大改道。这种周期性的灾变，一方面是由自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盐铁论·水旱》。

③ 李约瑟1974年4月2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参见1974年5月29日香港《大公报》。

自然界自身的运行规律决定的,同时又是在人类社会的影响下发生作用的。当政治相对清明、社会控制自然的能力较强的时候,便能因势利导,如兴修水利,利用自然界的有利条件增加收获,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反之,如果政治腐败甚至战乱,控制自然的能力就会减弱。更不用说人为制造的灾乱,如军事上常采用大面积火攻和水淹以及由战乱而带来的瘟疫等。

社会的动乱、社会的失控,导致本来就脆弱的制驭自然的力量的丧失,从而导致同样具有周期性的自然灾害危害的加重,往往在人祸酷烈、民不聊生之际,便是天灾肆虐、瘟疫流行之时,这样又形成天灾人祸的叠加。如自东汉中期起,土地兼并逐渐加剧,朝廷内外宦官专权,卖官鬻爵,政治腐败,民不堪命,社会因之逐步陷入动乱,终于酿成公元184年黄巾军大起义。东汉政权失控,名存实亡,豪强割据,军阀混战,屠戮之凶,史无前例,到东汉最后四五十年,旱灾、虫灾、瘟疫更相继蔓延,“旱蝗少谷,百姓相食”,^①瘟疫所到,“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二世纪后期到三世纪二十年代)几十年间,在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人口下降达75%(另一说法为下降85%)。^②又如后梁(公元907—923年),朱温父子与李克用父子交战,在短短十来年,梁将就多次扒黄河堤以阻敌兵,美其名曰“护驾水”,河水散漫千余里,使今河南、山东黄河沿岸一带人烟稠密的膏腴之地没为泽国。仅五代半个世纪,黄河自然和人为的决口就达9次之多。据《旧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公元910年至953年42年间,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24次。这些水灾虽然不都是故意制造的,但是由于连年战争,水利失修,致使成灾率及灾害的程度大增,因此,即使天灾实际上也有社会因素起作用。^③

历史事实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运动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波浪式或螺旋式的运动本身并不是历史发展的例外,而是体现了事物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它的特殊性仅在于:由于中国的地域空间和人口的数量规模的巨大,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重重叠加,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起伏的波幅格外大,但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人口数量、农业文明的优势等原因,又未形成如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西亚两河流域)、古印度、希腊、罗马以及美洲玛雅文明那种多次出现的文化断裂。中国每次从动乱滑到深渊,再恢复安定,回升到新的发展高峰,耗时也就特别长。自秦统一中国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实现安定统一,共计2172年。台湾经济学家翁之镛将这2172年按时间顺序分盛世、治世、小休、衰微、乱世五种类型进行了分类统计(参见表1),其中“盛世”时间最短,真所谓好景不长,“盛世”加上“治世”也不过占五分之一时间;而仅“乱世”就占了近一半时间,实在是“长夜难明”。翁之镛所划的10个“乱世”与大陆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张善余从人口增减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胡焕庸、张善余在《世界人口地理》中估计,中国封建时代致使人口减少过半的大动乱至少也有10次。^④他们在《中国人口地理》中又列出了中

表1 中国历来治乱循环分析简表
(公元前221年——公元1951年)

	盛世	治世	小休	衰微	乱世
次数	2	5	4	6	10
合计年数	150	286	234	466	1035
占总年数的百分比	6.9%	13.2%	10.5%	21.2%	48.2%

资料来源:翁之镛:《中国经济问题探原》,第80—82页,台北中正书局1952年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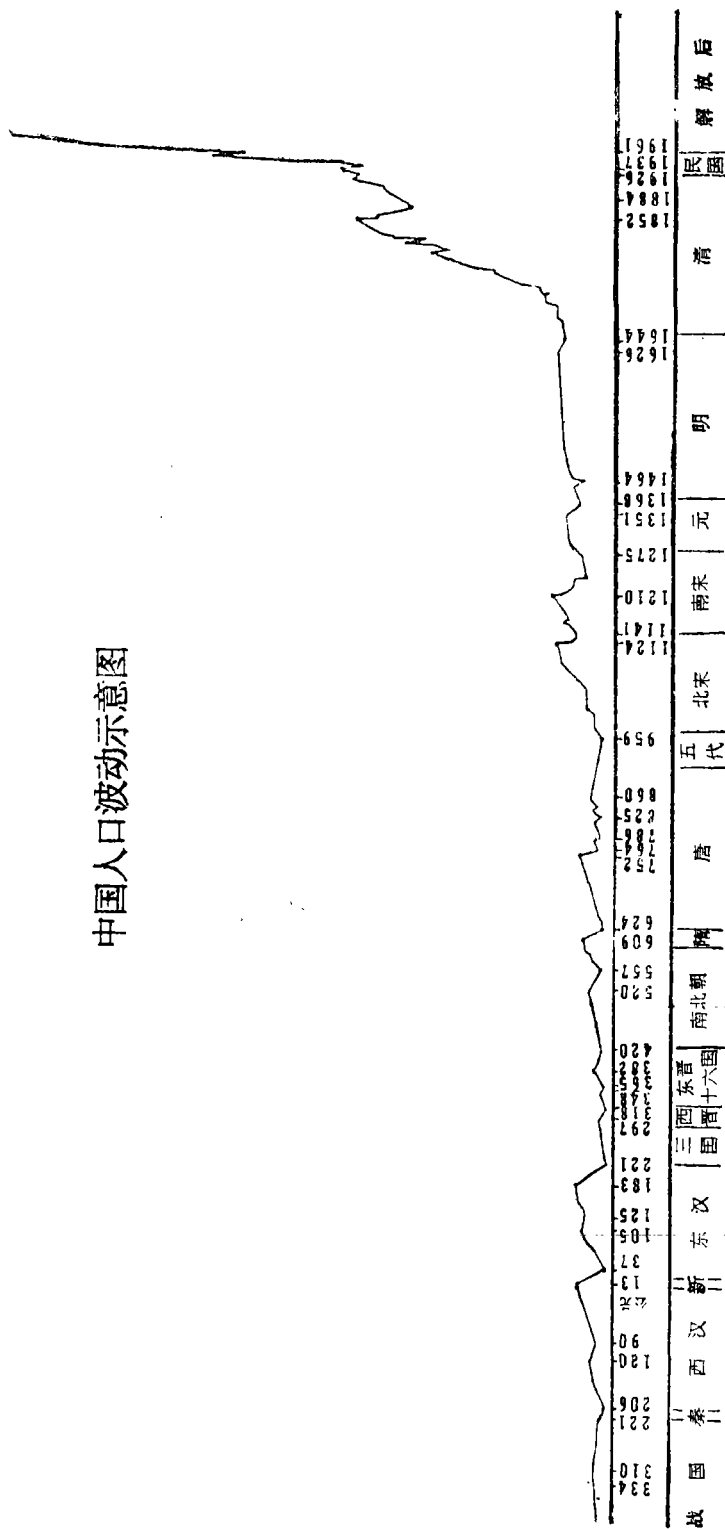
① 《后汉书·吕布传》。

② 参见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5—2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册,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④ 参见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世界人口地理》第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人口波动示意图



资料来源: 赵文林、淑君著:《中国人口史》, 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国封建社会人口变动曲线中的比较突出的12个波谷，这12个波谷都是全国范围的社会大动乱造成的：（1）战国末年至秦汉之交，人口比前一个峰值减少约一半。（2）西汉末年，特别是新莽时期，人口减少约六成。（3）东汉末年至三国之初，减幅超过75%，堪称空前的浩劫。（4）十六国时期，人口损失数缺乏可靠材料，据史料中的片断记载，为数亦很惊人，以北方为最烈。（5）南朝后期至隋初，人口减少约三成。（6）隋末唐初，人口减少大约一半。（7）“安史之乱”，在很短时期内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以上。（8）唐末和五代十国，减幅逾三成。（9）北宋末年，人口损失主要在黄、淮流域，总数不详。（10）元灭金、宋，人口减少约三分之一。（11）元末明初，人口减少约四分之一。（12）明末清初，减幅近五成（该书第12—13页）。以后赵文林、谢淑君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和补充给出了我国4千年来人口波动的曲线图。现截取战国以来的人口波动曲线图如上。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创造者和承担者，用现代信息论的语言表述即：人是社会经济文化的活载体。尤其在农业自然经济时代，在生产工具、技术构成和生活方式、生产率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就是生产力的标示，一定社会的劳动力和人口数量就是这一社会的综合经济力量、经济水平以及这一经济基础承载人口的能力的体现，所以，**人口周期大体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周期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1.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特别是地形和气候）复杂，东部大河流域农业文明发育早，但大西北、大西南的草原、沙漠地区和山区却干旱缺水或土地贫瘠、交通困难，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开发迟而发展缓慢，遂使中国农业文明的空间推进规模大、时耗长。

2. 中国封建时代农业社会的内在矛盾形成的“内周期”、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形成的“外周期”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叠加，更加上这种叠加而形成的社会运行周期与自然现象运行周期的叠加与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波幅大、延时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演进的大周期。

3. 大小周期之间却又未出现过如其他许多文明古国那样的间断，因而这首尾相连的不间断的周期性运行延续的总时间就特别长。

以上便是中国封建社会运行在空间、时间和轨迹上的三大特征。

主要参考文献：

- ① 司马迁等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 ②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 ③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④ 傅筑夫著：《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⑤ 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 ⑥ 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⑦ 翁之镛著：《中国经济问题探原》，台北中正书局1952年初版。
- ⑧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中文版。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宛丽